

国际贸易政治的研究方法、 政策意识和中国取向 ——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

宋国友

以经济相互依赖为表征的全球化日益深入,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在各种经济联系中,贸易无疑是其中最为古老,同时也是最为直接的一种。对于国际贸易,最初的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展开,重点关注贸易如何发生、贸易制度的演变以及贸易壁垒的形成和消除等内容。随着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审视国际贸易的研究逐渐流行。该角度立足于国际政治的立场,主要研究贸易和权力——包括国内权力和国际权力——的相互影响,产生了一大批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国际学界在国际贸易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也激起了国内学界的巨大反响和回应,国内不少学者近年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有益尝试。^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教授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全球贸易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一书当属于其中较为系统全面的一本。^②

*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邮编:200433)

① 最近几年,仅就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国内相关专著而言,有宋国友《平衡社会利益和国家安全:政府对外贸易战略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余森杰《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保建云《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及政策选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李增刚《双层博弈框架下的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理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另外,在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中,大都涉及国际贸易政治研究。学术论文中有关此主题的研究就更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② 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全球贸易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8 年版。



王勇教授在北大任教多年,其学术旨趣一直专注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贸易政治理论两大方面,并在上述两个领域均有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和专著问世。《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他在长期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对中美经贸关系实证研究的理论延伸思考,因此非常值得一读。

考虑到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被普遍认为和国际金融政治经济学、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投资政治经济学等并列,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显著分支,本书在导论部分扼要论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四大价值和三大流派”等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并以此为架构,指出了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所应关注的研究范畴和问题领域。在导论部分,本书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种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行“重构”的思路,把“社会”凝练出来作为与传统理论中的“国家”和“市场”并列的行为体,并由此主张应从通常的“国家—市场”两分拓展至更为切合实际的“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模式。确实,如果仅仅从国家和市场两分的角度来审视国际贸易政治,将会过分扩大国家和市场的影响,忽略了此二者之外现实存在的、对国家贸易政策制定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行为体。全面识别出贸易政治中的行为体并认识到其利益诉求和权力机制,是进行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的第一步。只有在准确明晰行为体的前提下,才可能进行关于“谁受损”、“谁得益”,以及“谁调整”等后续问题的探索。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其核心在于对国家间贸易关系进行政治解读。这种政治解读既来自经济学,也来自国际政治学。本书用两章的篇幅分别从这两大学科对贸易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分析。在经济学层面,先后引入了古典理论、新古典理论、新贸易理论及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国际政治学层面,分别从经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霸权稳定论、激进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方面进行了解释。由于学科立场的固有差异,经济学的解释更多的是围绕着贸易如何促进国家的福利展开,其主要关注各个国家绝对收益的提升,较少涉及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国际政治学则主要以权力概念为核心,强调相对收益的作用,并分析贸易对于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

影响。^①即便是脱胎于经济学理念的自由主义国际贸易政治理论主张贸易作为国家间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国际制度的护持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权力对于国家的束缚,但其根本着眼点还是在于分析贸易对于政治、权力和安全的影响。

虽然国际贸易政治学的研究需要有跨学科的知识,提倡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和藩篱,从而实现有利于学科发展的交叉和融合,但是这种交叉和融合更多地应体现在研究方法和学科知识方面,不能以侵蚀甚至消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学科价值为代价。换言之,贸易政治连接贸易和政治的“双重性”并不意味着两者在研究本质上的“并重性”。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必须要重视其政治属性,坚守权力(以及安全)等核心概念,否则就可能因为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本质属性遭受弱化,而退化成为经济学框架内的纯粹国际贸易研究,进而损害其独立性和辨识度。本书“导论”也因此明确把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定位为“是研究在一项贸易政策出台或在一种贸易体制安排中利益格局及其政治经济过程”。^②

在对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框架性和基础性知识进行介绍后,本书随后分章节转向对贸易政治领域各个重要子领域的研究。本书着重选取了五大贸易子议题,分别为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巨变、地区一体化、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与多边贸易体制以及公民社会运动。这五大子议题大致涵盖了贸易领域的诸重要问题,展示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图景。在阐述过程中,这五章也延续了作者在第一、二和三章所努力构建的学术特色脉络。这些特色集中体现在:第一,坚持经济学和政治的双重理论视角。在每一个贸易子议题领域,作者均精心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两个角度去理解和点评该子议题的本质,着力避免某个单一学科的垄断性解释。即使是来自于同一个学科的解释,也兼顾了不同的观点;第二,突出社会行为体的能动作用。尤其是第八章,力图挣脱国家和市场的旧有思维束缚,创新性地以社会运动为主线重塑贸易政治学的主体;第三,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西方中心、欧美中心及美国中

^① 尽管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大视角出发的研究大都继续围绕着各自的学科核心概念加以展开,但如今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合流现象,并产生了令人振奋的成果。比如,经济学教授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从事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国际学界理解游说和利益集团如何影响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参见 Gene M.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Cambridge, N. J.: MIT Press, 2001; Gene M. 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 “Protection for Sale,” *American Economy Review*, Vol. 8, No. 4, 1994, pp. 833-850。由希斯考克斯所著并荣获 1997 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最佳国际关系论文奖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借鉴了经济学研究中的要素理论,并以此为关键变量来分析其对政治冲突的影响。参见 Michael J. Hiscox,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Cambridge,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上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贸易政治层面。

^② 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第 16 页。

心。在现有的主流著作中,发达国家无论是从理论创建及案例提供上,都处于压倒性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作为重要研究客体及利益主体的角色由于西方学者的学术权力而被有意无意地部分隐匿了。^①与这种学术上的“被隐匿”相对应的,则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被忽视的权力和权益。在本书的第四、五、七和八章,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利益被重新发现和关照。

在一些子议题所涉及的更为细节的具体内容中,作者也有意选取了一些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即使是在后金融危机的当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比如,第四章有关全球经济平衡以及贸易平衡问题的讨论,第五章有关东亚地区主义的叙述,第七章关于多哈回合谈判的分析,对于当前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都有着很好的文献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因为涉及到贸易情况,所以如果要很好地阐述某一个问题的,需要大量的贸易数据支持,否则论证很可能不到位。因此,有说服力的贸易政治经济学专著通常会广泛使用统计数据作为不可或缺的论据。而且很多时候,数据并不仅限于贸易统计数据,还包括政治统计数据,比如议会党派席位统计及议员投票情况等等。而恰当的数据处理——包括数据的选取、获得、分类以及计算,以笔者的实际经历来看,实在是一个费心费力的过程。特别是如果这种数据是原创性、大规模的话,所耗精力将更多。

王勇教授的这本专著在数据搜集和使用方面匠心独运,花了相当多的心思。在每个贸易子领域的研究章节,都使用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契合了定性的文字表达,有力论证了文章的论点。这些数据通常以图表展示,简单直观翔实。此外,几乎所有图表数据都有具体出处。^②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也如实进行了说明,有些图表还辅之以必要的注释。^③这不仅展现了严谨的学风,也为其他学者更好地理解这些数据,以及进行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

本书的数据分析法也引出了国内学界一个较为重要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数据使用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在使用的时候,还要避免一种误解,认为仅仅用图表的“简单”方式列出数据及对数据进行初步的计算加工,远不如其他定量化的研究方法“炫目”,比如大样本的统计方法以及假设模型

^①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非全部被西方学者所垄断。比如,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探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贸易关系的“依附论”,其提出者主要为拉美学者。

^② 唯一没有注明出处的表格为表 5-2,第 158 页。

^③ 如表 4-1、表 6-1 等,分别参见第 111 页和 202 页。

验证方法。事实上,能够掌握并且娴熟运用那些更为精巧和深奥的模型假定及回归分析等方法,固然更符合经济学研究的趋势,也是研究方法上的某种提升,但并非贸易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必需。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对贸易问题和贸易现象背后的政治关系进行研究。就现阶段的中国学术研究实际而言,更为重要的要具有贸易政治意识,识别出真正具有政治经济学研究意义的贸易问题。如果过于沉迷和强调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借鉴,非但不必要,反而有可能陷入研究方法的“技术陷阱”,忽略对于重大贸易政治问题的把握和研究。在大多数时候,清晰易懂的“简单”数据反而可能会更好地说明贸易政治的本质。

本书还注重从政策角度出发来阐述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这种与作者一直从事中美经贸关系及两国的经济政策制定研究颇为相关。^①由于有了政策分析的坚实基础及相应地对于现实的把握,王勇教授在介绍某一贸易子议题所涉及的政策时就显得驾轻就熟。比如,在本书第四章介绍地区贸易一体化时,作者对于欧盟和美国在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的政策梳理重点突出、切中要害。这种政策和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于更好地理解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有着很大的帮助,也非常需要。目前,在包括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现象。从事理论研究的更宁愿专心于纯粹的理论,从事政策研究的更执著于具体的政策。两者之间缺少必要的交集。以笔者拙见,理想中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应该是理论之“学”和政策之“术”的有机结合,存有两条底线式的要求:其一,即便在理论研究中没有对贸易政策的具体涉及,也要超越从理论到理论的书面循环引证,对具体贸易议题上国家政策的历史变迁以及现实变化要了然于胸;其二,在进行贸易政策分析时,即便不在论文或专著中刻意体现,也应有内化的理论意识,争取把对贸易政策制定的个别分析上升为规律或模式的总结。总而言之,不论是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或者是政策研究,两者可以有侧重,但要有偏废,更不能有对立和轻视。^②

三

在研读国内有关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及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时候,笔者特别期待能够学习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理论或实证研究,因为很难想

^① 参见王勇《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有关国际问题研究中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相脱节及如何弥合的有益分析,参见《国际政治研究》在2009年第3期的“主题讨论”。

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出口国会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出现“主体性”缺位。王勇教授在本书“自序”中,同样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在未来国际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将会更大,但同时也敏锐观察到外部对中国学界的研究了解不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中国“缺失”现象,值得“反思和讨论”。^①

王勇教授试图在本书中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重点研究来覆盖到中国,毕竟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这只是一种中国关怀的间接体现,中国不是普通身份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和贸易体量已经远超其他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因此,在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还可以有意识地加强直接基于中国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问题研究,进而相应地至少达到三种效果。在理论层面,总结出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创新性贸易政治理论;在政策层面,较好地阐释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因素;在问题层面,清晰地解释某一个中国具体贸易问题的政治原因和后果。理论、政策及问题研究三者之间界限并不清晰,很多时候自然交织在一起,难以分离,不同学者可以根据自身研究兴趣和特长来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

把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和中国进行结合的研究大致上有两种演进。第一是把中国“嵌入”到具体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议题中。比如,如果按照本书的逻辑,就出现了全球经济与贸易格局中的中国、中国的地区贸易一体化政策、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民社会运动等研究课题;第二种演进是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较为主流的“国内—国际”互动视角来重新构建出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国议题。^②完整的“国内—国际”互动应该包含四个具体场域:国内场域、国内至国际场域、国际至国内场域以及国际场域。在每一个贸易政治经济场域,都可以发掘出重要的中国问题,包括但不限于:(1)在国内政治场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制定受哪些国内利益行为体的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何;(2)在国内至国际场域,中国的贸易政策如何改变国际贸易体制及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3)在国际至国内场域,国际贸易制度的变迁及其他贸易强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中国国内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有何显著塑造,这些行为体又是如何应对;(4)在国际场域,中国和其他国际贸易行为体如何就重大国际贸易议题进行政治博弈,如全球贸易平衡及多哈回合谈判。

相较于其他三个场域,在国内政治场域的中国贸易政治研究更引人入胜,也尤为急迫。但从现有文献看,除了存在较少地把西方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套用到中

^① 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自序”,第3页。

^② 王勇教授在本书“导论”部分对此略有涉及。参见王勇《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导论第5—6页。

国的通论式理论概括外,国内学界有关中国贸易政策制定的深入的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如鲜见有关中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部委关系、中央地方互动和利益集团游说的相关文献。^①有些类似的国内研究甚至不得不去引证国外学者关于中国贸易政策制定的文献。而作为一种常识,学界关于某国贸易政治的权威研究理应由该国学者提供。^②

王勇教授及其他各位学界同仁在此方面的学术呼吁、已有的认真思考及开创性的不断探索,加之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和贸易体系中的作用更趋凸现,中国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将会取得更具影响力的成果,进而为国际学界贡献来自中国的声音。

① 公允地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不能完全归咎于学者,也有学术研究以外的不可控因素。不管原因如何,即使该领域的学者其实或多或少对于中国国内贸易政治有着各种认识和评估,却在正式文献上罕有成文发表。

② 比如,学者要研究美国的国内贸易政治,德斯勒所著的《美国贸易政治》一书是必修的。参见 I. M. Destler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